



总顾问 / 张书珩
主 编 / 刘人杰

中国文学史

(四)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中国文学史

(第四卷)

总顾问：张书珩

主 编：刘人杰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第二章 北宋中期文学

北宋中期的文学包括从宋仁宗天圣初年至宋哲宗元符年间的七十余年（1023—1100）的文学发展状况。这段时期，北宋王朝一片歌舞升平的背后，民族的和阶级的矛盾日益深刻化和复杂化，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里几乎都出现了变革和斗争。在政治上，改良运动贯串了这一时期，最初是范仲淹、欧阳修的变法，它失败以后不久又出现了王安石的变法。但是，后一个改革范围更广泛、规模更巨大、措施更激进的变法运动，也在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利益的旧党人物反对下宣告失败了。后来“新”、“旧”党争虽然还延续了很长一个时期，但新法却名存而实亡了。在哲学思想上，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出现了王安石的新学和洛学、关学、蜀学等新儒学派系的对立，以致最后导致理学定于一尊，禁锢了思想。只有文学上的革新运动是以胜利而告终的。经过当时作家的努力，诗、词、散文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建立了宋一代的特殊风格，出现了一个文学创作的繁荣局面。

诗歌方面，欧阳修倡导和领导了一场诗文革新运动，使诗歌摆脱了西昆体的浮艳晦涩，又经过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努力，宋诗开始走上健康之路。到王安石、苏轼登上诗坛，宋诗更日益丰富多采。宋代诗歌的发展道路也是在这个时期被奠定下来的。

词的创作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作品数量日益增加，题材不断扩大，风格逐步提高，最后也和诗文一样欣欣向荣起来。早在上一个时期末就开始写词的晏殊和柳永，他们的作品有许多不同之处。晏殊虽然在词的艺术上有所发展，但还没有完全脱去“花间派”的情调。接着进入词坛的欧阳修和晏几道，在词风上也和他很相近，继承多于创造。就在同一个时期，柳永和苏轼走着另外的路子，对词的发展作了更多的贡献，柳永是北宋“婉约”词派的早期代表。他不但扩大了词的题材，而且在促使慢词的成熟上也大有贡献。至苏轼一登上词坛，词国的领域顿为扩大，词界的风貌顿为改观。他提高了词的地位，使之成为长短句之诗；开拓了词的思想内容，使之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冲破了婉约风格的一统天下，开旷达与豪放之风。正如刘辰翁所评：“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散文方面，这次革新是在宋初“复古”运动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规模和成就当然更大，欧阳修一方面反对晚唐以来的不良文风，一方面提倡继承韩愈的道统和文统。由于他的影响，产生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和苏辙等作家。他们便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宋代六个大家。尽管他们的散文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不一致，

但其中有不少优秀的文章却是事实，而且他们还共同扫清了绮靡晦涩的文风，使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因此，从我国文学史上说，北宋中叶是唐代古文运动以后的又一个散文的繁荣时期，对后世的影响极其巨大。

第一节 范仲淹和诗文革新运动

北宋诗文革新是在政治革新、儒学复兴推动下，并遵循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而蓬勃兴起的。仁宗在位时期，面对辽与西夏的不断进扰和国内社会矛盾的加剧，统治集团内部改革政治的呼声日益高涨。庆历初年，宋对西夏用兵失败，辽统治者乘机索要土地，国内接连爆发农民起义和军卒暴动，国家财政状况愈趋恶化。为形势所迫，宋仁宗“遂欲更天下弊事”于庆历三年（1034）起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仲淹修《上十事疏》，提出政治改革的十项措施，包括明黜陟、精贡举、均公田、修武备等内容。这些改革措施被称为“庆历新政”。

诗文革新的主要人物多是庆历新政的参与者或支持者，新政的主导人物范仲淹也是诗文革新的积极鼓吹者。新政改革贡举，也涉及教育制度和考试内容等问题。他们主张复古兴学，废除“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的旧考试制度。由此可见，诗文革新与新政相互呼应，是政治改革在文化方面的回响。但诗文革新又并非新政的简单延伸，其酝酿远在新政提出之前。新政推行两年便因其他政治势力反对、仁宗撤回支持而宣告失败，而诗文革新却保持强劲势头，并未遇到有力阻挠，取得显著成绩。这说明，诗文革新适应了封建社会更长远的意识形态需要，得到地主阶级内部比较广泛的支持。仁宗时期，曾于天圣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和庆历四年（1044）三次下诏申诫浮文，宣称“文章所宗，必以理实为要”。诗文革新的开展显然受到最高统治者一再训戒的鼓励。

另一方面，诗文革新运动也是对唐末五代以来浮糜文风的一种剧烈反对。宋初柳开以尊韩和文道合一为号召，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比他稍后的穆修，也未免“曲高和寡”之叹。因此，在这一阶段中，一些以复兴儒道为己任的人，便沿着他们的方向发出更响亮的呼声，乃至提出更极端的主张。

仁宗时期大力鼓吹儒学复古的有孙复、胡瑗、石介等人，他们被后代理学家奉为先驱人物。

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学者称徂徕先生。有《徂徕石先生文集》。他的学术思想传自孙复，注重道统，“有慕韩愈节，有肩柳开志”。当时杨亿早已去世，但昆体影响仍然很大。在《上赵先生书》中，他指出：人们对于西昆体，是“父训其子，兄教其弟，童而朱研其口，长而组绣于手，天下靡然向风，寢以成俗。”因此感到非常痛心，他认为浮华的文风和其它社会上的不良风习一样，也是有害于道的，于是便写了《怪说》上中下三篇，以中篇最能代表其主张，

其文曰：

或曰：天下不谓之怪，子谓之怪。今有子不谓怪，而天下谓之怪。请为子而言之，可乎？

曰：奚其为怪也？曰：昔杨翰林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忧天下未尽信己之道，于是盲天下人目，聋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见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聋，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灭，乃发其盲，开其聋，使天下惟见己之道，惟闻己之道，莫知其他。

今天下有杨亿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聋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见有杨亿之道；使天下人耳聋，不闻有杨亿之道。俟杨亿道灭，乃发其盲，开其聋，使目惟见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惟闻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畴、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则为怪矣。

夫《书》则有尧舜《典》、皋陶益稷《谟》、《禹贡》、箕子之《洪范》，诗则有大小雅、《周颂》、《商颂》、《鲁颂》，《春秋》则有圣人之经，《易》则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杨亿穷妍极态，缓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刳箴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入之道。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缓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

是人欲乎其怪而就于无怪，今天下反谓之怪而怪之，呜呼！

在《尊韩》一文中，石介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

道始于伏羲氏，而成终于孔子。道已成终矣，不生圣人可也。故自孔子来二千余年矣，不生圣人。若孟轲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孔子后，道屡废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道已大明矣，不生贤人可也。故自吏部来三百有余年矣，不生贤人。若柳仲涂、孙汉公、张晦之、贾公竦，祖述吏部而师尊之，其志实降。

噫！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虞舜氏、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圣人，孔子为圣人之至。噫！孟轲氏、荀况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五贤人，吏部为贤人之至。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不知更几千百数年，复有吏部。孔子之《易》、《春秋》，自圣人来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谗臣论》，自诸子以来未有也。呜呼至矣！

在《上赵先生书》和《上蔡副枢密书》两文中，石介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谨上书先生左右：

介近得姚铉《唐文粹》及《昌黎集》。观其述作，有三代制度，两汉遗风，殊不类今之文。曰诗赋者，曰碑颂者，曰铭赞者，或序记，或书箴，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大者驱引帝皇王之道，施于国家，教于人民，以佐神灵，以浸虫鱼；次者正百度，叙百官，和阴阳，平四时，以舒畅元化，辑安四方。

今之为文，其主者不过句读妍巧，对偶的当而已；极美者不过事实繁多，声律调谐而已。雕镂篆刻伤其本，浮华缘饰丧其真，于教化仁义礼乐刑政，则缺然无仿佛者。

《易》曰：“文明以止。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春秋》传曰：“经纬天地曰文。”尧则曰“钦明文思”。禹则曰“文命敷于四海”。周则曰“郁郁乎文哉”。汉则曰“文章尔雅，训辞深厚”。今之文何其衰乎？去唐百余年，其间文人，计以千数，而斯文寂寥缺坏，久而不振者，非今之人尽不贤于唐之人，尽不能为唐之文也。盖其弊由于朝廷敦好时俗，习尚染积，非一朝一夕也。不有大贤奋袂于其间，崛然而起，将无革之者乎？

唐之初，承陈、隋剥乱之后，余人薄俗，尚染齐、梁流风，文体卑弱，气质丛胜，犹未足以鼓舞万物，声明六合。逮章武皇帝负羲、轩之姿，怀唐、虞之材，卓然起立于轩墀之上，武功戡定海内，刮疵剔瑕，乾清坤宁，以文德化成天下，惊潜烛幽，雷动日烜。韩吏部愈，应期会而生，学独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己，乃《空桑》、《云和》，千数百年希阔泯灭已亡之曲，独唱于万千人间。众人耳惯，所听惟郑、卫恣恣之声，忽然闻其太古之上，无为之世，雅颂正始之音，恍惚茫昧，如丧聪，如失明，有骇而亟走者，有陋而窃笑者，有怒而大骂者。丛聚嘲噪，万口应答，声无穷休。爱而喜、前而听、随而和者，惟柳宗元、皇甫湜、李翱、李观、李汉、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辈，数十子而已。吏部志复古道，奋不顾死，难接斥摧毁，日百千端，曾不少改所守；数十子亦皆协赞附会，能穷精毕力，效吏部之所为。故以一吏部数十子力，能胜百万千人之众人，能起三数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于日月，浑浑灏灏，浸如江海，同于三代，驾于两汉者，吏部与数十子之力也。

今天子继明守成，道德高厚，功业巍然，直与唐并。今卿士大夫，垂绅曳组，森森布列，行羲超然，直与唐比。独斯文邈乎不可视于唐，居上者点画语言，组织章句。如彼画工，不知绘事后素以为质，但夸其藻火之明，丹漆之多。如彼追师，不知良玉不琢以为美，但夸其雕刻之工，文理之缛，载毫犂笔，穷山刊木，模刻其文字，布于天下，以为后进。耳所习闻，声名赫奕，位望显盛者；惟是不知前人有孟轲、扬雄、董仲舒、司马相如、贾谊、韩吏部、柳宗元之才之雄也。目所常见，制作淫丽，文辞侈靡者；惟是不知前世有三代两汉钜唐之文之懿也。父训其子，兄教其弟，童而朱研其口，长而组绣于手，天下靡然向风，寔以成俗。吁！无变之者，有以待先生也；如

唐之弊，变之待吏部也。继唐之文章，绍吏部之志，维先生能，先生无与让。

先生识与天地相际接，学臻古今蕴奥，名节德范，人伦师表。所谓有皋、夔之才，伊、吕之志，周、孔之道，轲、雄之文。施之于一国之间，和风仁声，油然其洽矣；施之于廊庙之上，皇猷帝功，卓然其成矣。而命与才戾，四十始登一第，仕才得上农夫之禄，料不能得居庙堂之上，调变化，订谟百度，尧、舜其君，仁寿其民也。天岂虚先生于世哉？《传》曰：“五百年一贤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杨子，杨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验欤？孔子、孟子、杨子、文中子、吏部，皆不虚生也。存厥道于亿万世，迄于今而道益明也，名不朽也。今淫文害雅，世教堕坏，扶颠持危，当在有道。先生岂得不危乎？仲尼云：“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深切著明也。”

先生如果欲有为，则请先生为吏部。介愿率士建中之徒，为李翱、李观。先生唱于上，介等和于下；先生击其左，介等攻其右；先生犄之，介等角之。又岂知不能胜兹万百千人之众，革兹百数千年之弊，使有宋之文，赫然为盛，与大汉相视，钜唐同风哉！语曰：“当仁不让于师。”孔子不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孟子不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杨子不曰“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文中子不曰“千载之下有绍仲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吏部不曰“释、老之害过于杨、墨，吾欲全之于已坏之后，使其道由愈而粗传”；盖知其道在已不得而让也。今者道实在于先生，岂得让乎？介窃痛斯文衰，道不克，力不足，不能救。世有贤儒君子，天下所属意，岂特区区小子，窃有望乎左右。先生留意焉。

——《上赵先生书》

……夫有天地故有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文之所由生也。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文之所由见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所由用也。三皇之书，言大道也，谓之三坟；五帝之书，言常道也，谓之五典。文之所由迹也。四始六义存乎《诗》，典谟诰誓存乎《书》，安上治民存乎《礼》，移风易俗存乎《乐》，穷理尽性存乎《易》，惩恶劝善存乎《春秋》，文之所由著也。

文之时义大矣哉！故《春秋》传曰：“经纬天地曰文。”《易》曰：“文明刚健。”《语》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三王之政曰“教质莫若文”。尧之德曰“焕乎其有文章”。舜则曰“浚哲文明”。禹则曰“文命敷于四海”。周则曰“郁郁乎文哉”。汉则曰“与三代同风”。故两仪，文之体也；三纲，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质也；九畴，文之数也；道德，文之本也；礼乐，文之饰也；教悌，文之美也；功业，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

政，文之纲也；号令，文之声也。圣人职文者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具两仪之体，布三纲之象，全五常之质，叙九畴之数。道德以本之，礼乐以饰之，孝悌以美之，功业以容之，教化以明之，刑政以纲之，号令以声之。灿然其君臣之道也，昭然其父子之义也，和然其夫妇之顺也。尊卑有法，上下有纪，贵贱不乱，内外不渎，风俗归厚，人伦既正，而王道成矣。

今夫文者，以风云为之体，花木为之象，辞华为之质，韵句为之数，声律为之本，雕镂为之饰，组绣为之美，浮浅为之容，华丹为之明，对偶为之纲，郑、卫为之声，浮薄相扇，风流忘返，遗两仪三纲五常九畴而为之文也，弃礼乐孝悌功业教化刑政号令而为之文也。圣人职之，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君臣何由明，父子何由亲，夫妇何由顺，尊卑何由纪，贵贱何由叙，内外何由别？而化日以薄，风日以淫，俗日以僻。此其为今之时弊也。……

——《上蔡副枢密书》

石介从维护“圣人之道”的立场出发，彻底否定了西昆派的文学追求。庆历二年（1024），石介入召为国子监直讲，运用主讲太学的权力，升降诸生，讥诮时文之作，“时引退者数十人”。

尹洙（1001~1045），字师鲁，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天圣二年（1024）进士。他曾师从穆修，接续了宋初古文创作传统。据记载，他在洛阳时曾与欧阳修同作《双桂楼记》，欧文千馀言，尹止用五百字，欧服其简古，“自此始为古文”（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尹洙还曾告欧阳修：“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欧阳修持此说以作文，“尤完粹有法”（《湘山野录》卷中）。欧阳修后来在《尹师鲁墓志铭》中，将“简而有法”作为古文写作的基本原则肯定下来，以反对骈文的繁而芜杂之病。他的文章最善议论，尤善论兵，有《叙燕》、《息戍》、《兵制》等代表作。范仲淹称其“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欧阳修亦称其深得《春秋》之旨，“简而有法”，可见言而有据，见解深刻，严谨精简为其文风之主要特色。如《兵制》一文，用极简炼的语言，一语破的地道出北宋军事力量衰弱的政治原因，乃抑制武臣，专用儒吏，颇具战略目光。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庆历元年为陕西经略副使，新政失败后改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等地。谥文正。有《范文正公文集》。范仲淹为官清廉，在宋代官吏中实为罕见。吕夷简执政时进用多出己门，范仲淹上《百官图》及四论，讥切时政，得到尹洙、欧阳修等人支持，被吕指为朋党，罢知饶州，掀起了北宋第一次大规模的朋党之争。西夏元昊反，范仲淹被启用为户部郎中兼知延州，因用兵有方，守边有功，进为参知政事。庆历三年（1043）仁宗采纳他所上十事，推行了北宋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革新——庆历新政，但因规模阔大，不得要领而很快失败。从其一生事迹看，范仲淹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北宋的朋党之争与政治革新之始都是以他为核心。

范仲淹论文切于实而重于情，对晚唐五代的“薄弱”文风和西昆及其追随者“刻辞镂意，有希仿佛，……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的因陈浮艳文风



范仲淹

多所批判。在这基础上，他还能对西昆的弊端进行较深入的分析：“学步不至，效颦则多，以至靡靡增华，愔愔相滥，仰不主乎规谏，俯不主乎劝诫。”作为政治家，他还强调利用行政手段推行文学改革，曾上书皇帝，“敦谕词臣，兴复古道，……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

范仲淹的文学创作虽不甚富，但文、诗、词皆有传世之作。其主要特点是内容切于实际，多能“主乎规谏，主乎劝诫”；感情激昂真切，既能“顾其分”，又能“观其时”；风格清雄悲壮，绝少“靡靡增华，愔愔相滥”之作，和他的文学主张及人品都极为相副。

例如散文《岳阳楼记》就是体现了他的人品和文学主张的代表作：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忽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岳阳楼之大观已被前人写尽，范仲淹不再赘述，只将登楼览物之情，归出悲喜二意，并由此翻出后文忧乐一段大议论，以抒其忧国忧民，感时伤世之情。据欧阳修为其所撰神道碑铭载：“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所以《岳阳楼记》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正是范仲淹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入世思想的体现。然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内还存在着出世的一面。范仲淹在贬居睦州时作的《严先生祠堂记》就是出世思想的体现。《严先生祠堂记》着意标榜了严光耿介不屈的高风亮节，全篇充满了对严光的仰慕之情。在宋代吏治颓败、冗官充斥、官场中钻营阿谀之风盛行之时，范仲淹高度赞扬严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品德，认为它可以使“贪夫廉，懦夫立”而“大有功于名教”。全文以“相守以道”为核心，在论述这种思想时，用“以节高之”和“以礼下之”来加以具体表现，“大有功于名教”则是这种友谊的

許比部作道服贊辭莊義舒鬱
乎有德之言哉南北分合餘二百年
而幅員疆理復混為一區公之孫曾嗣
守先業不懈益恭得公書遺蘇才
翁韓文公伯夷頌真迹而寶蓄之且
摹刻于石今年至正元年益都宗人

范仲淹《道服贊》

良好社会影响。范仲淹感慨地说：“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俸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范仲淹的诗也同样反映了他对国家、社会、百姓的忧思，其《赠钓者诗》云：

江上往来人，尽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涛里。

又《观渡诗》：

一棹轻如叶，旁观亦损神。他时在地，无忽险中人。

作为政治家的范仲淹，他的思想在当时不可能实现，作为文学家的他，只好将其付诸笔端。《野色》一诗即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

非烟亦非雾，幂幂映楼台。白鸟忽点破，夕阳还照开。

肯随芳草歇，疑逐远帆来。谁会山公意，登高醉始回。

范仲淹文学成就最大者是词。他的若干作品，思想深邃，感情沉挚，风格悲壮，决不类于同时代的一般作品，在宋初词坛上可谓异军突起，并开后来苏辛豪放派之先河。如《苏幕遮·怀旧》：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这首词以深深的笔触，抒写了“去国之情”，成为后代传诵不衰的名篇。

又如《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词中暗示了戍边生活的艰苦，并抒发感慨，把思乡和报国的复杂感情一道吐出，并在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豪情的同时，流露出忧国恤卒的心绪。此词作于康定元年（1040—1043）间，是词人戍边生活的真实写照。据宋人魏泰《东轩笔录》中说：“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阙，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镇边之劳苦。”这首词却是数阙中仅存的一首。

范仲淹也有抒发人生感慨之作，为后人所传诵。如下面三首：

纷纷坠叶飘香彻。夜寂静、寒声碎。珍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御街行·秋日怀旧》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腌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

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浦映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

桃源路。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
与。争教我辈无欢绪。

——《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

范仲淹以大政治家的身份涉足文学，因而他论文切实，对晚唐五代的“薄弱”文风和西昆及其追随者“刻辞镂意”、“专事藻绘”的浮艳文风多有批判。

范仲淹的文学创作虽不甚丰，但文、诗、词皆有佳作，内容切于实际，立意主乎规谏，感情激昂真切，风格清雄悲壮。可以说为北宋中叶文学形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欧阳修和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兴起于唐德宗、宪宗年间，经过韩、柳等人的大力倡导，无论从实践或理论上，从内容或形式上，都形成了散文的优良传统。但到了晚唐、五代时期，浮靡的骈骊之文却重又得势，这反映了动乱时代文人逃避现实的游离和彷徨，也正是这种风气使得古文的发展受到妨碍。到了北宋，古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就其性质而言，唐代的古文运动是复西汉、先秦之古，宋代的第二次古文运动则是复韩、柳之古，名为复古，实际上是针对晚唐、五代文弊和西昆体的流行而进行的革新。《神宗旧史·欧阳修传》云：

国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剝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辞。如杨亿、刘筠辈，其学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于流俗，反吹波扬澜，助其气势。一时慕效，谓其文为昆体。时韩愈文，人尚未知读也。修始年十五六，于邻家壁角破麓中得本学之，后独能摆弃时俗故步，与刘向、班固、韩愈、柳宗元争驰逐。是时，尹洙与修亦皆以古文倡率学者，然洙材下，人莫之与。至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向慕，为之犹恐不及。一时文章大变，庶几乎西汉之盛者，由修发之。

足见欧阳修是以韩文作为学习的楷模来扭转昆体的骈骊之习的代表人物。

北宋中叶的文学革新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欧阳修领导并完成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或新古文运动，确立了散文文的正宗地位，使骈体文在六朝以来六百年间所占的优势从此告终。由于古文运动的强大影响，产生了宋四六和文赋；宋诗也开始形成自身独特的风格，卓然与唐诗并峙比美。

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对诗文革新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团结尹洙（师鲁）、石延年（曼卿）、范仲淹（希文）、苏舜钦（子美）、梅尧臣（圣俞）诸人，在仁宗年间开创了新局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三《宛陵集》提要说：“佐修以变文体者，尹洙；佐修以变诗体者，则尧臣也。”同时，他又注意培养后起之秀，提携尚不知名的作者，如王安石、曾巩、苏洵及其二子轼、辙，都是他识拔或荐举的。他们六个人与韩愈、柳宗元后来被人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其中如王安石和苏轼，同时又是杰出的诗人。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永丰）人。二十三岁中进士后，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当时西昆体作家钱惟演任留守，幕府有尹洙、梅尧臣。任满至京师充馆阁校勘，担任三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所藏图籍编校。因写信给谏官高若讷责备他诋毁范仲淹，被降官为夷陵令。庆历新政时任知谏院。又升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后范仲淹等新政大臣以党议罢去，欧阳修上书反对，降知制诰知滁州。这就是著名一时的《朋党论》。



欧阳修

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大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谓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此后欧阳修又先后知扬州、颍州、应天府。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奉诏修《唐书》，迁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曾出使契丹。英宗即位后，官至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等职。神宗时，出守青州、蔡州，在他自己一再请求下致仕。此后他的进取心逐渐淡泊，于六十岁时即连乞谢事。当时王安石新法已行，欧阳修对其多持怀疑和抵制态度，特别是对弊端较多的青苗法明确表示反对，使王安石不满，终于神宗熙宁四年（1071）以太子少师致仕。卒后谥“文忠”，有《欧阳文忠公集》留世。

欧阳修对宋朝政治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多次指责朝廷因循苟且，对“骄兵”、“冗吏”不满，主张吏治和军事的改革；对西夏，他反对议和，主张积极备战，在学术和文学方面，他是开一代风气的宗师。苏轼在《居士集序》中说：“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又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1023—1031）景祐（1034—1037）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

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1056—1063）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欧阳修在经学方面，对《易》、《诗》、《春秋》，都有研究，他常常信经而不信传，对传统经说提出怀疑，开启了以“新义”解经的新学风。他请求删修经疏，并认为古书之托为“圣人之作”者，往往是后人所作。欧阳修在史学方面的成绩是很突出的。他奉诏与宋祁一起重编《唐书》，后称《新唐书》。又独立编写《五代史》，后称《新五代史》，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以为当代的借鉴。治史之外，他又收集金石器物，著《集古录》，为研究历史提供实物证据，并用以破除对佛教的迷信。他的《六一诗话》在诗歌评论方面开创了一个新的形式。此外，在目录学等方面欧阳修也颇有成就。

欧阳修远继韩愈、柳宗元，近承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等古文的提倡者，适应北宋政治改革的需要，成为领导诗文革新的宗师，是宋代的韩愈。他对文和道的关系的看法和韩愈一致，认为道对文起决定作用。他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东坡集·祭欧阳文忠公文》）。又说，“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欧阳文忠公集·答祖择之书》。）但欧阳修论道更重实际，他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说：

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岂不为文？孟轲之言道，岂不为道？且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

欧阳修及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所论的道，不同于理学家的道，实际是论政。另一方面，欧阳修也指出，有道之士，并不一定能写文章，而道又以文传。他说，“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见于后世。”又说，“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彰，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彰”，可见，他并没有把“文”与“道”等同起来。他要求文章“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他提倡“文简而意深”，“简而有法”，主张平易自然，反对尚奇趋险。

这在《论尹师鲁墓誌》中有明确阐释：

《誌》言：“天下之人，识与不识，皆知师鲁文学议论才能。”则文学之长，议论之高，才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条析其事，再述于后。

述其文，则曰：“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故虽有法，而不简也。修于师鲁之文不薄矣。而世之无识者，不考文之轻重，但责言之多少，云师鲁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

既述其文，则又述其学曰：“通知古今。”此语若必求其可当者，惟孔、孟也。

既述其学，则又述其论议云：“是是非非，务尽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随。”亦非孟子不可当此语。

既述其论议，则又述其才能，备言：师鲁历贬，自兵兴便在陕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为而元昊臣，师鲁得罪。使天下之人，尽知师鲁才能。